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

预计今年经济增速与去年持平

CPI 上涨 4%左右,投资稳定增长至关重要



余斌

■ 本报记者 蒋皓

1月20日,由中国经济年鉴社主办的2013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会在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就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做了发言,他预计2013年经济增长将与2012年大体持平,物价涨幅会略有提高,一系列价格改革可能会启动,预计2013年CPI会上涨4%左右。《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余斌发言后做了进一步采访。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2013年经济增长跟2012年基本持平或者略有回升,您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余斌:总体上我认为2013年有可能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良好趋势,我们可以从支撑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出口这三大需求的增长上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012年中国出口增长只有7.9%,这是美欧债务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经济低迷,整个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后果。预计2013年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情况会略有好转,中国出口的增长将会好于2012年,可能会达到10%左右。

从消费来说,2012年消费的增长保持了很高的水平,实际增长达到了12.1%以上。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一种持续回落的趋势,但是我们的就业状况良好,城乡居民的收入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我们认为这种趋势在2013年还会延续,消费的实际增长有可能跟2012年基本持平或者略有提高。

从投资的增长来看,尽管现在投资的增长有一定下行的态势,但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相应的调整,比如通过营改增减轻企业的负担,用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来稳定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执行“十二五”规划(因为基础设施投资离“十二五”规划还有很大差距),这样我们也可以保持2013年投资的增长基本稳定。

如果出口消费投资的增长跟2012年基本持平或者略有好转,我们就可以得出基本判断,2013年经济增长跟2012年基本持平或者略有回升。

《中国企业报》:学界对今年GDP增速有分歧,有些人认为是8.6、8.2,国研中心是8.0,您个人认为中国政府把GDP的目标定在多少比较合适?

余斌: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了这个指标,但现在还是保密,到三月份两会才能公布,这个不好说。

我自己判断的是2013年经济增长和2012年的基本持平或者略有好转。我刚才也讲了为什么学界会存在分歧,去年4季度和3季度相比,GDP回升了0.5个百分点,如果这种回升是一种持续的,那么2013年将形成一种高速增长的新态势,也就是说,2013年经济增长可能进入9时代,有人认为是8.5,有人会有更高的估计。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处在一个重大调整和转型的过程当中,而且说实话,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10%的高速增长阶段,对于中国来说,7%—8%的增长已经是非常好的增长。

党的十八大中提出的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1年翻一番(的目标),2011年我们是9.3的增长,2012年我们是7.8的增长,在未来的8年中我们只需要保持接近平均7%的增长,离7%稍微还差一点也可以,我们就能实现翻番的目标。也就是说中国未来7%—8%的增长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增长,而不能说它是负增长。

如果非得要把经济目标定在10%以上,它会带来通胀,危及中长期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说,我认为目前的状态是一种比较合适的状态。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今年宏观经济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什么?

余斌:尽管美国两党就“财政悬崖”问题已经初步达成协议,但是两党是否能够形成新的共识仍需观望。

从欧洲的情况来说,2012年是比

较糟糕的,2013年会略有好转,但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比如像西班牙的问题、意大利的问题,包括法国的问题,这都是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的。你要知道,2012年主要是希腊在折腾,希腊是一个小的经济体,我刚才说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都是全球经济总量排名前12位的国家,如果他们爆发债务危机,经济波动将对整个欧洲整个世界产生很大影响。

同时新兴经济体比如印度、巴西、俄罗斯,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他们都属于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的国家,2013年是否能好转,能够多大程度地实现回升,这对中国经济来说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企业报》:如果上述情况发生,我们有无政策储备来应对这种情况?

余斌:如果外部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只能依靠内需,内需就是投资和消费这两个可选择的,我认为,短期内大幅提升消费的增长可能性并不大,关键就是投资的稳定增长,这是至关重要的。

长期趋势一定是需要逐步降低投资率而提高消费率,但问题是根据短期的经济发展的变化,我们是可以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比如说外需是稳定的,消费是上升的,我们就可以让投资率逐步的回落;如果短期之内出口大幅度的滑坡,而消费在短期内又不能够弥补出口下降所形成的缺口,那就依赖于投资。

《中国企业报》:欧洲是我们第一大出口地,那里的出口情况跟2012年比会怎么样?

余斌:从最坏的情况来说,我们确实认为存在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很小,而问题确实是有

的。万一他们(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发生债务危机欧盟成员国)真出现什么问题,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这些问题早就做好预案。从可能性上来说,他们是可能慢慢度过这个危机的。宏观部这两天一直在开国际会议,我们请了欧盟的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欧盟的政府官员,昨天中午我和欧盟政府官员一直讨论了一个多小时,那么欧洲的情况究竟会怎么样,大多数人会认为跟2012年比会有所好转,所以出口的增长相对会递增。

《中国企业报》:关于投资,地方债是不是要再开展?

余斌:我们中心宏观部去年提了好几个这样的建议,我们希望能够扩大地方债。说实话,不用地方债而用投融资平台合箱操作,你都不知道地方政府欠了多少债务,风险更大。如果公开发债,起码告诉筹集10个亿的资金干什么去了,拿什么还,老百姓为什么买债,这至少是公开的、透明的,决策是否可能是科学的,来替代原有的暗箱操作,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一直建议这样做。但是,只有几个地方在试点。

《中国企业报》:您刚说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自由发行地方债,“有条件”指的是什么?

余斌:即使政策允许发债,也不是所有债都可以发。发地方债要经过审核,要有偿还能力,不至于积累风险,这种情况下是允许发债的,并不是谁都可以发。

中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但有些有很好的基础设施,过去这些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没有能力做这种事情,断腿很多,如果将断腿补上来,他们的经济会陷入良性循环。



防范讨薪悲剧应从清理企业“三角债”入手

■ 孟志强

再过十几天,就是蛇年的春节,不少人已经开始踏上了回家团圆的旅途。然而,就在这个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节日就要来临的时候,广州一名男子为讨薪引爆了身上的爆炸物品,该男子伤重死亡,另有7人受伤,本应喜庆团圆的春节却成悲剧。

自从2003年重庆农妇熊德明请温家宝总理帮忙讨薪以来,10年过去了,农民工讨薪的话题依旧年年不约而至,农民工被欠薪造成的悲剧成了挥之不去的魔咒。从“跳楼秀”到“爬吊塔”,从“活埋”自己到“拜财神”,再到今天的自杀式爆炸,农民工的讨薪之路依然充满艰辛和无奈。

10年来,相关部门为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可谓是费尽心机,2003年国务院两部门通知要求,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名目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

资。2006年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被列为做好农民工七项工作之首。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恶意欠薪入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可被处以七年有期徒刑。另外,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每到年底也会出台各种帮助农民工讨薪的措施。然而,时至今日,措施不可谓不多,法也不可谓不重,悲剧却依然不断上演,问题出在了哪里?

维权成本太高,执法力度不够,是被提到较多的原因。一份来自相关机构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这显然是农民工不能承受之重。《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鲜有人因恶意欠薪的罪名被治罪,也让法律的震慑性有所降低。

诚然,这些都是农民工被欠薪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人们似乎忽视了一个颇为重要的关键问题:企业间的循环欠欠,让一些企业根本没有能力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人们在讨论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时更多从道德“愿意”的层面上考虑问题,却较少关注相关企业的实际支付“能力”层面。

据媒体报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and 中小企业被拖欠账款增多的情况明显加剧。毋庸讳言,在中国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些“店大欺客”的状况依然存在,一些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现象仍然较多。

据报道,有的中小企业被拖欠账款最高已经超过了企业应收账款总额的80%。其中,要求中小企业先付货且双方不签订合同的超过50%,不按合同付款的占合同总额的67%,最长年限超过了5年。“比例高、数量大、时间

长”是中小企业被一些大型企业拖欠账款情况的形象总结。这种情况进一步导致了中小企业间循环拖欠,使处于债务链中的中小企业无法正常经营,遑论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事关社会文明和伦理底线,处于强势地位、占有先天优势的大型企业则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带动中小企业发展,而非“店大欺客”,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以致使得“按时足额支付”成为中小企业不能承受之重。政府部门也应逐步建立和架构规范企业间循环拖欠问题的框架准则,为中小企业具备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能力提供制度保障。

2011年4月,人社部宣布,将用3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避免讨薪悲剧不妨先从规范企业间循环拖欠入手。

中国式环保:

买来的是设备 买不来的是理念

“

目前,持续多日的雾霾已退出天气舞台。但由此次雾霾事件引发的全社会关于环境保护议题的思考,却刚刚开始。通过进口先进设备,建立强大的环境空气监测体系,不难看出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重视程度和改善空气质量的决心。减少直至根除雾霾天气的关键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树立环保理念。

■ 胡海燕

近日,中国中东部地区相继陷入严重雾霾之中。12日,北京PM2.5指数也濒临“爆表”。连日来,包括上海、广东等省份在内的多地也持续出现雾霾天。PM2.5再成公共热词。

作为造成灰霾天气的“元凶”之一,PM2.5是一个英语缩写和数字的结合,PM表示Particulate Matter即颗粒物,2.5则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直径不到头发丝粗细1/20的PM2.5飘动的却是至少20亿元的监测设备市场。有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PM2.5检测设备80%靠进口,政府、企业所使用的大量的治污设备也非国产。

目前,持续多日的雾霾已退出天气舞台。但由此次雾霾事件引发的全社会关于环境保护议题的思考,却刚刚开始。

众所周知,雾霾与环境污染紧密相关。据专家介绍,导致雾霾天气的元凶便是工业污染、尾气排放和燃煤取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分析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这三项是雾霾的主要组成,污染源排放量是造成本次严重污染的根本原因。”工业污染主要来源于水泥、钢铁、焦化、火电厂、化工制造和有色金属冶炼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这些行业占二氧化硫总排放的85%以上,而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却已远远高于它们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

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至2011年,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成就可谓举世瞩目。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建立在消耗并不十分丰富却较廉价的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

长期以来,为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中国以促进GDP增长为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在GDP考核的指挥棒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积累政绩,招商引资时热衷于引进能源、重工业企业项目,从而对拉动GDP增长、增加就业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些企业大部分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对环境的伤害着实严重,却被一再忽视。因此唯GDP发展论使得重发展、轻环境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负效应已不断显现,而其中空气污染最为突出。此次中东部地区的雾霾事件便是其中一例。

针对日益严重的污染,为监测空气质量,中国正着手建立空气检测体系,环保部表示,“十二五”期间,国家和地方共计投入约9.5亿元重点支持第一阶段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建设,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已扩大到338个地级市,国内要建设近1500多个PM2.5监测点位,前期投入将超过20亿元。因目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水平较低,符合使用标准 and 要求的国产产品并不多,所以80%的PM2.5检测设备需靠进口。

通过进口先进设备,建立强大的环境空气监测体系,不难看出,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重视程度和改善空气质量的决心。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全社会仍然没有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没有形成环保理念,那么,政府在环保方面投入再多的钱也只能是打水漂,减少直至根除雾霾天气的关键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树立环保理念。试想,如果我们对于自身不经意行为造成污染的危事认识模糊,认为对环境的伤害很小,在这种思维的作用下,社会就会对限制污染排放停留在只减不做的层面。

形成全社会的环保理念,一要进行思想教育疏导,二要实行强制措施。思想教育疏导是要让全社会认识到,雾霾天气乃至其他环境污染是一种灾害,是危害健康的毒药,不治理污染,就是充当人民健康的杀手,形成一种全民共识。强制措施则是通过制定严厉的禁排举措,确保全社会环保行为习惯的养成。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转变部分地方重发展、轻环境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不仅需要国家进一步强化节能减排的考核和约束,更需要地方政府转变理念,综合考虑GDP增长的环保成本,从而切实转变增长方式,减少环境污染。

几十年来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拉动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却也导致了环境问题的集中爆发。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GDP增长的辉煌使我们有意识或无意忽略了在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如今,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目前,国家已十分重视环境问题的治理,如不惜重金通过购买进口设备建立空气质量监测体系。虽然靠金钱能够进口设备,但是环境问题的最终彻底治理是金钱所买不到的,最根本的是要形成全民环保的理念。作为环境中的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让环保理念扎根于脑海中,并融入日常生产生活的血液中。